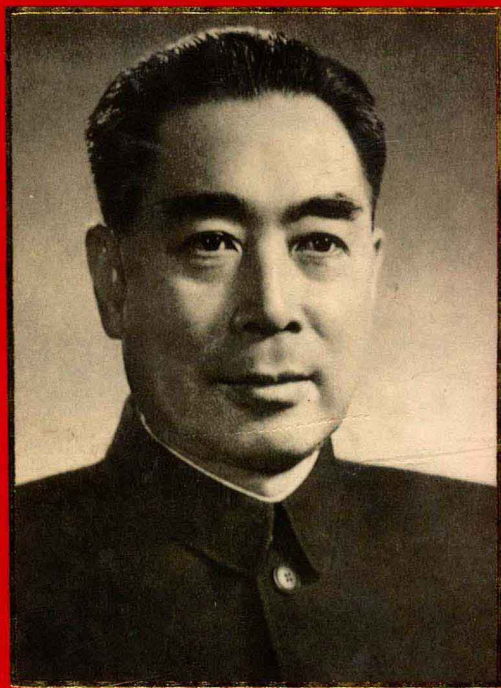


A GREAT
DICTIONARY
CONCERNING
ZHOU EN-LAI



周恩来
大辞典

周恩来大辞典

**A GREAT
DICTIONARY
CONCERNING
ZHOU EN LAI**

广西人民出版社

漓江出版社

周恩来大辞典

曹光哲 等主编

*

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
漓江出版社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1.5 插页 24 页 字数: 1977 千字

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ISBN 7—219—03402—4/K · 514

定价: 115.00 元

序

纪念和学习历史伟人周恩来

廖盖隆

1998年3月5日，是已故“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周恩来大辞典》的编撰出版就是为了纪念和学习周恩来，而主要是为了学习周恩来的。这部大辞典的出版，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对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各级领导干部研究和学习周恩来，继承和发扬他的宝贵的理论遗产、革命精神和完美品德，以促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无疑将具有重大意义。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是20世纪中国和世界的伟人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人们对于周恩来极高的历史地位，对于他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多方面的伟大成就和贡献，包括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重大卓越的贡献，他提出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正确思想对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所作的非常重要的奠基工作，对于周恩来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完美典范，作为一个与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呼吸相通、血肉相连的革命领导人的完美楷模的多方面的高贵品德，还是认识得不够，学习得不够的。笔者不揣浅陋，谨写出下面几点体会，以供读者参考。

一、毛泽东、周恩来共同领导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近代以来，中国多次出现了“双星”现象，例如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有洪（秀全）、杨（秀清），戊戌维新运动有康（有为）、梁（启超），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有孙（中山）、黄（兴），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有南陈（独秀）、北李（大钊）。

有人说，毛周两人，毛是出大主意的，主要是战略家；周是实现毛的战略的，主要是组织家，即所谓“谋事在毛，成事在周”。笔者以为这个说法基本上对，但不完全。说毛主要是拿大主意的，是战略家是不错的；但说周仅仅是执行人、组织家，却不完全。比较完全的说法应该是：毛泽东是以他自己为集中代表的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理论（即毛泽东思想）和路线的主要决策人、集大成者；而周恩来（特别是自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则是这个理论和路线的决策人之一和主要执行人。周恩来之所以首先是决策人之一，是因为周恩来从1927年以来将近50年间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核心的成员（而毛泽东是1935年1月以后才进入最高领导核心的），他对党本身的全面情况最了解，对共产国际这个中国党的顶头上司最了解，对蒋介石、帝国主义的情况（敌情）最了解，对各种中间力量的情况（友情）最了解；周恩来又是真正精通唯物辩证法的，考虑问题最全面、最细致、最周密，毛泽东作出决策之前，是不能不同周恩来这个高明的“参谋长”磋商的。周恩来又是一个首先提出和实行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实现手段要因时制宜，也就是主张要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人，他在留法时期（1921年到1924年）和大革命时期（1925年到1927年），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许多重要看法都是同毛泽东不谋而合的。但是作为战略家，毛泽东比周恩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作出决断时也更果断，更勇敢。正因为这样，而且因为周恩来也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遵义会议以后，从党和革命的全局利益出发，把自己作为“党内受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的职权心甘情愿地让给比自己更强的毛泽东去行使，而自己则退居原来分配给毛泽东的“帮助者”的地位。当然，帮助不只是执行，而且首先是帮助决策。因此，雄才大略的领袖毛泽东，是离不开经验丰富、处事精明的另一位党和人民的重要领袖周恩来的帮助决策和组织实施他的决策的。没有周恩来，毛泽东不可能完成他已

经完成的伟大事业。另一方面，周恩来也离不开毛泽东在大主意上的决策、指引。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不可能这样充分发挥他的缜密而广泛复杂的决策作用和非凡的组织才能，因而也不可能完成他已经完成的伟大事业。

从历史上来看，从遵义会议以来，毛周共同领导完成了长征，共同反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党的行为；毛周共同决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由周恩来组织实施；在抗日战争时期，毛周共同决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周恩来作为党的全权代表，担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主要方面军的主帅；在解放战争时期，周开头是为了争取以和平方式进行民主改革，以后是为了揭露美蒋而同美蒋进行了一年多的谈判斗争。周 1946 年 11 月返回延安，而蒋介石于 1947 年 3 月进攻延安后，他就以军委副主席担任了毛泽东的名符其实的“参谋长”。建国以来，毛泽东担任了 27 年党的主席，周恩来则当了 27 年政府总理。这些都说明了毛周是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双星”。

中国的人民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毛泽东、周恩来共同领导的，这一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有了定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指出：“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领导我们党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后来被林彪、‘四人帮’打断了，破坏了。”

1979 年 9 月 29 日，由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叶剑英在庆祝建国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给我们留下的政治遗嘱，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百折不挠地加以实现的奋斗目标。”

邓小平在 1985 年 3 月 4 日一次谈话中说：“从政治角度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时候，就强调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认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制定中国的国策，同样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这些评价都是很正确的，是我们认识周恩来应有的极高历史地位的重要依据。

二、周恩来的伟大历史功绩，仅居于毛泽东之后而占第二位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周恩来在1921年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早在1921年到1924年的留法时期，就明确地认识到了中国革命要分为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两步走，“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他明确地认识到了在国民革命中，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列强和旧军阀、封建余孽、洋买办、官僚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海外华侨、工人阶级、知识界、新兴工商业家、农民阶级这五派人是最值得注意的国民革命势力，“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才能救中国；我们要实行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和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即联合国际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明确地认识到了：“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这些就是周恩来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的非常宝贵的成果。因为他在刚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说过：“我们当信共产主义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先提出的接近于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提法。至于他在1922年10月写的真正的革命非有革命军队不可的那一段话说明周恩来是最早、最清醒地、联系实际地认识到革命军队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的中国共产党人。

周恩来1924年9月回到广东之后，立即投入迅速高涨的群众大革命洪流。他同年10月参与平定商团叛乱的指挥工作；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为黄埔军校学生军，随后又为整个国民革命军创立了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并联系中国实际的革命政治工作，从而保证了以后1925年两次东征和1926年到1927年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时他也开始创建了由中国共产党自己领导的人民军队，这就是1924年11月取得孙中山同意后组建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和1925年11月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的第四军有2000人的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这个独立团后来担任北伐先锋，所向无敌，使它自己、第四军和中国共产党名震全国。周恩来领导了1925年2月至5月、10月至11月两次东征军队的政治工作。正是他领导的革命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加上周恩来参与指挥关键性战役，并亲临前线，激励士气，才迅速取得了两次东征的胜利，实现了孙中山多年来未能实现的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宿愿。

以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席卷全国为标志，中国进入了全国性群众大革命高潮，周恩来也推进了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7月31日，他在香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政治报告中，回答了国民革命的主力军是哪些阶级？哪个阶级应当是国民革命的领袖？怎样去夺取国民革命的胜利等重大问题。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现在中国工人、农民、士兵的生活十分痛苦，“这些痛苦是帝国主义给我们的”，帝国主义是工农兵的共同敌人。打倒这个敌人的唯一方法是“工农兵大联合”。报告说：“工人不仅要努力做工人运动，而且要努力跑入军队里去做军士运动。”“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周恩来在这个报告中，突出了“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的观点，工农兵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的观点，指明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唯一方法是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兵大联合”（这是讲国民革命的主力军），或者参照周恩来在留法时期的提法，说得更完全些，是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兵学商（还有华侨）的大联合”（这是讲国民革命的整个阵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周恩来提出的这个“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兵学商的大联合，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卓越思想，同毛泽东在1925年底提出的，国民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的统治”，即“革命民众统治”，或“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内涵是完全一致的，两者都是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成果，都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的框架初步形成的重大贡献。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双星”毛泽东、周恩来，使我们想起了1847、1848年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双星”——马克思和恩格斯。

就在广州时期，周恩来认识了毛泽东。例如，1926年夏天，周应毛的邀请，在毛主持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了《农民运动与军事运动》。周在报告中指出，西方的社会革命与东方——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同的地方很多，“而其最重要者就是农民问题”。他还指出，黄埔学生军（在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中）所以所向无敌，不数月而肃清广东全境残敌，一方面是由于工农群众的拥护，一方面是由于士兵的觉悟。当时，从1925年底以来，以蒋介石为总头目的国民党新老右派结合在一起，还在一步步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进攻，毛周

两人和陈延年等都是坚决主张反击蒋介石，并扩大组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的，但坚持对蒋介石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却一步步地退让妥协，在召开国民党二大的问题上，在对待蒋介石制造三二〇事变的问题上，在对待1926年5月《整理党务案》的问题上，接连做了三次大让步，结果使蒋介石得以掌握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并攫取了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毛、周二人对此都是极为愤慨的。

1926年12月，周恩来秘密离开广东到上海就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他组织北方各省中共党组织做策应北伐军的工作，特别是强调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性。1927年2月，他就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精心地组织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担任起义总指挥。起义于3月21日发动，以3000工人武装纠察队为骨干组成的起义队伍，同驻守上海的毕庶澄的军警5000余人激战两天一夜，于22日下午6时攻下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取得武装起义的胜利。但仇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蒋介石部北伐军，却乘机进驻和控制了上海，攫取了工人武装起义的果实。3月22日，经上海市民代表会选举，产生了包括国民党将领白崇禧，大资产阶级代表虞洽卿、王晓籁、陈光甫等人在内的上海特别市政府委员会，但3月29日蒋介石却命令这个政府“暂缓办公”。眼看他就要下手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装、屠杀工人了。3月30日，周恩来出席领导武装起义的特别委员会会议，指出，蒋介石、白崇禧“对付我们已有预备”，“将来或许是借扰乱治安的名目来干”。

果然，蒋介石于4月11日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律实行‘清党’”。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解除工人武装，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的反革命政变。南京、广东、湖南、杭州等地随后也相继发生了同样的反革命事变。

但周恩来认为，只要及时对蒋介石实行军事反击，局面是完全可以扭转的。4月15日，他在中共区委主席团会议上说：“五万精兵一月即可削平”蒋的势力。随后他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意见书，建议“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在意见书上署名的还有赵世炎、罗亦农、尹宽、陈延年、李立三。但他们的这个建议，又不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所接受。随后，武汉的汪精卫也在7月15日发动反共“清党”政变。大革命遭到了惨痛失败。

在大革命即将完全失败的时候，7月12日，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改组了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5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委会，这是周恩来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开始。7月中旬汪精卫反共后，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执行发动群众武装起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新方针：决定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的秋收起义；同时决定即以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叶挺、贺龙等部国民革命军和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为基本力量发动南昌起义，并联合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返广东，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举行第二次北伐。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为南昌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负担起开辟土地革命新局面的重任。

周恩来领导于8月1日凌晨发动并随即取得胜利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标志着土地革命新时期的开始。正如周恩来后来在1957年7月下旬所说的：“八一南昌起义虽然没有达到挽救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的目的，而且这支起义队伍由于没有同当地的农民革命运动相结合，在离开南昌而南下到达广东省东部以后，大部分遭到了失败，但是，这次起义仍然具有伟大的意义，因为它明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政治方向，它是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和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这支起义部队中保存下来的一小部分，后来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的最初来源之一。”

他又说：“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起，直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红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举行为止这段时期，可以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时期。在这段时期中，最重要的成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一支工农革命武装在井冈山地区所创造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十月率领一支秋收起义的队伍，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发展土地革命斗争。一九二八年四月，南昌起义的一支队伍，在发动和参加了湘南农民起义斗争之后也到达了井冈山地区。这两支部队的会合，就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为红军中的骨干和核心，从而进一步发展了井冈山的斗争，奠定了中国红军和中国武装革命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所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件，就

是红军第四军在井冈山地区和赣南、闽西地区的斗争经验的总结。在这些文件中，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来，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①

领导南昌起义，无疑是周恩来的一个大功劳。起义失败后，周恩来抱病转移到香港。11月9日、10日，他回到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案》，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会议还对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遭到失败横加指责，他和前委其他成员，都受到警告处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也被认为“失败”，他在“八七会议”上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也被除名。但这次会议仍然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1月14日，中央常委分工，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组成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组织局，罗亦农为主任，随后因罗代表中央去武汉指导工作，由周恩来代理组织局主任。周恩来还领导中央军事科（即军委）、中央特务科的工作。

周恩来在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虽然未能反对会议的决议，但会后他对盲动主义的错误已有所察觉和认识。他发现和制止了江苏、浙江、福建、江西等省党组织的盲动主义错误。

周恩来创建了中央特科，从1927年底到1931年为止的4年间，有效地保证了中共中央秘密机关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的安全和顺利进行工作，特别是他果断、机智地消除了1931年3月和6月因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而发生的两次严重的险情。这是周恩来在保卫工作战线上对中国革命作出的一个特殊贡献。

周恩来在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和中央军委的工作中，在指导各地武装起义、建立根据地、发展红军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他在1928年2月16日说：“中国革命是不平衡的发展”，“割据有长时间的可能性，我们应有长期的准备。”2月19日，他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的信中说：“中国现在革命的发展，事实上形成特殊的方式：‘农民割据’。”（按：毛泽东称之为“工农武装割据”，是更科学的。——引用者）4月28日，周恩来出席临时中央

^① 《朱德选集》第356—357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朱德1957年7月31日这篇题为《光荣伟大的三十年》的讲话，是经过周恩来和朱德、陈毅讨论后，由朱德秘书主要按周恩来的意见写成的。

政治局会议发言说：“中国革命因为农民占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与俄国不同，由此发生一不平衡发展的问题。过去城市工作的确不好，但在中国很适宜地配合是很困难的，要这样必致引到乡村的等待，这是不好的。”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前委1929年9月指示信中，进一步提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这个提法，就进一步接近于毛泽东在1930年初步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了。

周恩来在党的建设问题上的重大贡献是，他首先提出了“党的改造是一个积极无产阶级化的问题”。1928年2月20日，他出席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发言说：李立三提出的在党的指导机关中应把知识分子的作用降到极小限度的意见是不对的，党的改造是一个积极无产阶级化的问题，对知识分子也应领导他们无产阶级化。

周恩来的这个重要思想，后来在同年6月30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所作组织问题的报告，和7月3日所作军事报告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并提到了全党面前。他在组织问题报告中，指出目前组织工作存在的问题是：（一）党的无产阶级化问题；（二）支部生活不健全；（三）组织上的错误倾向——命令主义、盲动主义、极端民主化、惩办主义、反知识分子倾向等；（四）不注意执行保密制度；（五）命令群众而不是说服群众，党代替了工会、农会。在军事报告中，他专门论述了建立红军的问题，指出红军的来源，应包括游击队的扩大和军阀军队的倒戈，一定要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方能有巩固的红军组织。红军的建军原则是：改变雇佣性；军官要无产阶级化；一定要有政治工作。这两个报告和11月11日发出的中共中央为贯彻六大决议《告全体同志书》，特别是其中周恩来撰写的第四部分，同周恩来主持起草的1929年9月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一样，是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的重要贡献，它们对于毛泽东建党建军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9年9月，周恩来圆满地解决了红四军内部的团结问题，维护了毛泽东在红四军的中心政治领导地位，并促使毛泽东全面地深刻地总结了红四军三年来的丰富经验，写成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个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件，这件事对中国革命此后的发展和胜利，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土地革命时期，周恩来的又一个贡献是他和瞿秋白在1930年9月纠正了在这年6月产生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立三路线要求立即发动全国总起义，调集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立三路线的发生同“左”倾盲动主义的发生一样，是受了斯大林提出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总危机时期、阶级大搏斗时期的理论和共产国际1929年先后四封来信对中国形势作了错误分析的影响。周恩来当然也受到了共产国际“左”倾指示的一些影响，但他反对李立三冒险蛮干的主张。自1929年秋冬以来，周恩来同李立三一直存在分歧，发生争论。周恩来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和直接革命形势是不同的，在主观力量不够的条件下，必须反对轻率发动武装起义的“左”倾冒险。但是1930年3月，周为了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去了莫斯科，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在中共中央便成了实际主持人。他在6月11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使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正式出台。立三路线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三四个月，但却使党的力量受了很大损失。共产国际这时认为李立三是犯了策略错误，让瞿秋白（当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按这一口径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他们先后于8月19日和26日回到上海，并于9月24日到28日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揭发、批评和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

就在三中全会前后，周恩来做了另外一件大事，这就是提出和实行把全党工作的中心转移到农村苏区。这件事是党史界迄今未予重视的。在提出工作中心转移这个问题以前，1930年7月5日，周恩来在苏联应邀出席联共（布）十六大，并作了题为《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报告强调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聚集革命力量的重要性。并说：“在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便有他特殊的产物——这便是中国工农革命的红军。”根据统计，当时全国红军已达67,200余人。7月下旬前后，周恩来会见斯大林，向他介绍了中国革命特别是红军的显著发展情况。斯大林对此很重视，他建议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根据斯大林的这个建议，周恩来先后向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提出，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苏区和发展红军，并得到国际和中央的同意。9月、10月间，周恩来和聂荣臻到为前往苏区工作的同志等办的训练班，传达

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把党的工作中心开始转到苏区的指示，并讲述工作中心转到苏区后的任务和工作等。10月12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央第九十一号通告强调，目前“有第一等重要意义的任务是：巩固与发展苏维埃区域，发动更广大的群众，集中与巩固红军的发展，加强党在苏维埃区域的领导”。1931年2月22日发出的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委电中也谈到：“现在正依照国际的指示，要从中央政治局起以60%的干部力量去加强和巩固苏区的领导”，“军事干部不论是在莫学过军事的或在国内做过军事工作的，都要以90%派往苏区”。为了加强党对苏区的领导，1930年10月17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再加上当地工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工作范围是全国各个苏区），周恩来为书记，周去中央苏区前，由项英临时代理。会议并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决定由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彭德怀、贺龙、黄公略、周逸群、叶剑英、张云逸、邓中夏、曾中生、邓发、邓小平、黄甦、袁国平、刘伯承、周恩来、关向应、恽代英、李富春等25人组成苏区军委。

把红军问题提到中国革命问题的首位，把全党工作中心从白区城市转移到苏区乡村，这就是对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和正确性的确认。更重要的是，这样做可以加强党在农村苏区的领导。当然，这样做同时就意味着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左”倾领导对原来处于半独立地位的各个苏区和各支红军的影响和控制的加强。但是，各个苏区和各支红军是必须逐步统一起来的，党的正确的统一的领导是必能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地形成的。因此，周恩来提出并实行把全党工作转移到农村苏区，无疑是他一个重大贡献，其意义的重大，不下于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

周恩来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再一个贡献是，他在四中全会前后，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态度，继续努力工作，维持了全党的团结；其错误是容忍了并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王明“左”倾路线。就在三中全会以后的10月间，李立三8月初所说的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等打下武汉再和共产国际算帐；并要求联共积极援助中国革命等话，传到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执委会因此把李立三的错误升级为“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是用假冒“左”派的空谈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米夫也乘此机会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到中国来，把他扶植的王明等

人拉出来掌握中共中央的领导权。米夫到中国后，在1931年1月7日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被塞进了中央委员会，王明还进入中央政治局，掌握了中共中央的实权。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被王明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周恩来纠正立三路线被他说成是犯了“调和主义路线错误”。米夫、王明在莫斯科时就反对瞿秋白，这时便把他排除出政治局，周恩来因为在党内有很高的威望和丰富的经验，则被他们留下来继续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样，土地革命时期党所犯的第二次“左”倾错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刚刚被克服，比立三路线更“左”、形态更完备、气焰更盛的第三次“左”倾错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又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而且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

周恩来当时没有也不可能起来反对共产国际和米夫，因为中国党是受共产国际领导的，米夫召开四中全会还是合法的。周被迫在会上检讨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同时提醒人们，不要搞派别斗争，不要把犯立三路线错误的人整得太狠，以致使党涣散削弱。周恩来在四中全会后，看到党内思想混乱，纷争不已，党面临分裂的现实威胁，内心“充满着苦闷”，但仍然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态度，拼命地工作，努力说服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在四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帮助党渡过困难时期。当时幸亏有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拼命工作，才维持了全党的团结以及中国党和共产国际的团结。周恩来的错误是他被迫容忍了并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但他并没有完全执行王明路线，而常常是抵制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的，因而仍然做出了许多贡献。例如他继续执行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农村的正确决定；他发现和纠正了苏区的肃反扩大化错误；他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维护了毛泽东，要求把他留在前线主持或协助主持战争；他抵制了临时中央的错误军事指挥，和朱德一起首创了大兵团伏击战术，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1933年9月李德到中央苏区后，他和朱德继续不断地对李德、博古的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反对意见，直到前方红军总部被撤销，周、朱被调回后方，实际上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为止。

但周恩来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最大贡献，也是他一生的最大贡献，就是1934年12月到1935年2月间，他对纠正王明“左”倾错误（首先是它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毛泽东正确路线在全党的领导地

位，作出了决定性贡献。王明“左”倾错误使白区党的力量损失了将近100%，使苏区党的力量损失了90%以上。这条路线在军事上的“左”倾错误领导，使党在1934年遭到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惨痛失败。到1934年12月1日湘江战役结束时，红军已从这年10月出发长征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接连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初期的惨痛失败的鲜明对比，教育了全军，尤其是教育了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12月上旬从过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发生争论，焦点在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王稼祥、洛甫（张闻天）公开批评中共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路线错误造成的。红军应采取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他们并向周恩来提出，鉴于在去二、六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建议转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12月11日，红军占领了湖南省内的通道县城。次日，中央一些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毛、张、王提出向贵州转兵的建议，多数人表示赞成，但李德、博古仍坚持要与二、六军团会合，周恩来表示同意毛、张、王的建议，博古说，那就先向贵州前进，以后行动再议。12月15日，红军攻克贵州省内的黎平县城。17日，周恩来到黎平，与朱德商量，决定不渡渍水河，而沿清水江南岸西进。周恩来向李德提出，红军需要休整，贵州敌人兵力比较薄弱，应当到那里去。李德拒绝采纳，因而发生争执。18日，周恩来（他是为准备战略转移而在1934年6月成立的“最高三人团”中管计划执行的成员，博古管政治，李德管军事）在黎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军事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目前已不可能，且不适宜”，“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鉴于中央内部有争论，会议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教训。12月31日到达瓮安县猴场（今草塘）。1935年1月1日，周恩来出席在猴场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大多数与会者一起反对博古、李德坚持不过乌江，要回头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会议通过《关于渡江（指

乌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改变了李德一个人包办而取消军委及政治局集体领导的独断专行做法,实际上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1月2日到6日,红军渡过乌江,7日占领遵义。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说红军的失利是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周恩来作副报告,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红军军事领导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主动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同时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张闻天根据3人提纲作了批判李德、博古军事领导错误的“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也作了重要发言。绝大多数与会者都拥护毛张王3人提纲和意见。李德坚决不接受对他的批评。会议最后决定:(一)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二)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最后决心的负责人。有人说,遵义会议开始的伟大历史转折,有些事情是没有做完的,直到2月上旬,在云南扎西县召开的几次会议才做完,这是对的。一是博古的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还没有撤销,而他实际上已不可能继续领导了。2月初,毛泽东向周恩来提议,由洛甫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认为这更利于党内团结。周恩来同意了,他还说服了博古交权。于是,2月5日在水田寨(即“鸡鸣三省”)由洛甫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宣布了洛甫在中央负总责,博古为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同时宣布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样就更便于毛泽东在军事上发挥决策作用。后来,由于军事问题什么都拿到有多数人参加的会议去讨论,既浪费时间,又容易争论不休,毛泽东建议还是集中些好,于是又建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样,军事领导问题也更好地解决了。二是2月7日在扎西的大河滩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审定和通过了洛甫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决议传达大纲》,并决定会后即向中下层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三是2月9日在扎西江西庙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